

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乡村旅游

左晓斯

[提 要] 后现代性与乡村旅游皆源于对现代性阴暗面的揭示或意识,作为一种思潮的后现代性与作为一种行动的乡村旅游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密切关系、通达性或不谋而合。乡村旅游的命运取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较量。无论较量的结果如何,它的最终结局都是悲剧性的。

[关键词] 现代性 后现代性 乡村旅游

[中图分类号] C9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05)01-0179-06

好恶交织的现代性与大众旅游的兴起

现代性一般被认为是与传统的决裂,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进步。将现代性当作崇高目标的现代化正在全球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蔓延开来,到处都在为取得现代化的成就而沾沾自喜。的确,现代化历程把我们从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使我们从野蛮走向文明,从短缺走向丰盛,从传统走向科学。现代化或与传统决裂的动力来自人类对自身理性力量的自信,这种自信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而萌发,并因资产阶级革命成功、资本主义兴起与封建制度的没落而增强,更随着科技发展与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物质进步而膨胀。这种过度膨胀的理性导致了一系列不幸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本文将现代性的后果概括为四大危机:

生存危机 虽然东西两大阵营不再对立,但拥有核武的国家更多,且由于核子武器的小型化和核武资料、原料可得性提升,核武扩散的危险大大增强,整个地球笼罩在核阴云之下。另一方面,常规战争与冲突、自然灾害与生态危机、社会治安、食品安全等问题处于失控的边缘。对于很多地方的人来说,虽然一般寿命延长,但生命却无时无刻不处于危机之中。

经济危机 周期性经济危机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而在全世界蔓延开来。即使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也难逃这种经济循环的折磨。

社会危机 在一个国家或社会内部,特别是新兴的现代化国家,由于事实上的资本主义化,劳资冲突与纠纷日趋激化;随着财富分布愈来愈不均衡,社会充满对抗与不满情绪;而在国家、地区与民族之间,或者为着利益,或者为着意识形态,或者为着历史旧怨长期为敌,相互对抗,

升级仇恨；更有甚者，以大欺小，以强凌弱。

精神危机 当现代人彻底摆脱了对上帝或神权、皇权的迷信和依恋，自我从原有的旧道德枷锁中解放出来而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体时，人类将信仰由他向转向自我，转向人类自身的理性。但今天人类面临的诸多致命难题大多是人类理性过度膨胀的产物。于是人类开始自我反思、自我怀疑。旧的上帝已死，新的上帝还没诞生。解放了的自我只能走向虚无主义，消极的虚无主义往往与享乐主义合谋而将人造就成为一个享乐的奴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过度流行，使人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走火入魔。太多的人把金钱或物质财富的赚取或占有当作了生活的全部意义和终极目的，因与生活需要无关的金钱得失而喜乐无常。

现代性就这样使人类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人们由此变得失落、彷徨，焦虑、烦恼，到处寻找妙药良方或解脱之道。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解脱方式，旅游的异质文化体验和对现实喧嚣生活方式的暂时逃避，就如烈日下的长途跋涉者终于觅得一处可以短暂栖身的树荫。旅游由此变得日益大众化，成为一种时尚——旅游反映了人们对现代性既爱又恨的矛盾纠缠心理，是现代生存条件下“好恶交织”的产物（王宁，1999）。的确，正是现代性的二重性构成了现代人追逐旅游的动力与压力。一方面，现代性为人们带来了技术进步与物质财富的相对丰盛，特别是便捷的现代交通、通讯条件，随生活水平提升而来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快速增长，使得旅游活动或者说是大众旅游有了可靠的经济技术基础与现实的可能；另一方面，现代性的阴暗面，特别是人类在现代生存条件下的异化、生活程式化、工作刻板化、都市化及随之而来的生活环境恶化、人际关系疏远化，使得旅游充满了大众对现代性无声的批判与控诉的色彩。旅游正是现代性这把寒光闪闪的“双刃剑”下人们本能的、暂时性和周期性的逃避与解脱方式。

大众旅游的麦当劳化与乡村旅游的崛起

然而，由于现代性的精神，尤其是其中的理性主义、工具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与标准化、程式化原则已渗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每个细胞，深入到现代人的思想深处，本是现代性暂时避难所的旅游亦已逐步现代化、工具化、程式化了。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兹尔提出了“社会的麦当劳化”论点。他认为，现代化过程当然也渗透到了休闲活动中，团队旅游就是最好的例子。旅行社的团队旅游按既定的线路、食宿标准以及成本收益原则严格操作。麦当劳快餐的经营方针是“快吃、快走”，吃完就走；现代团队旅游的方针是“快看、快走”，看完就走；游客被旅游车整团整团从一个景点高效运到另一个景点。运动中的游客就如运输带上的零件或物品，完全被操控，失去了自由，也很难有那些需要时间、静下来“细嚼慢咽”才可能有的品味与体验（何兰萍，2002）。渐渐地，一些人对现代的大众化旅游厌倦了。

与此同时，曾经一度被认为贫穷、落后、甚至是被遗忘角落的乡村，正由于相对闭塞，依然保留着至少是些许的传统色调，也基本脱离了作为现代性中心的都市喧嚣，作为新避难所终于落入了那些对现代性充满爱恨交织情结的城市部落的视野。乡村旅游由此成为人们出游的主要选择之一，成为旅游业最重要的产品之一。在西方，乡村旅游可追溯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城市人逃避工业污染和快节奏生活方式的途径而兴起。由于现代化进程加快，现代性的二重性日益突出，首先是一般意义上的旅游，其后是乡村旅游作为人们对现代性阴暗面的反应和抵抗，作为对现代性造成的异化、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恶化及生活节奏程式化的暂时解脱而流行起来。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区、美国加拿大的洛基山脉成为世界早期的乡村旅游热点，而非洲的肯尼亚、南

非，亚洲的泰国（北部）、中国的阳朔、周庄等，则是西方游客眼中乡村旅游的新宠。

中国乡村旅游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并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起来，但总体上仍未跨越初始阶段。这与中国现阶段的现代性状况相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尚未完成，国民大多刚刚进入小康社会；城乡差别依然巨大，城市尤其是大都市对人们的引力远大于推力，城市依然是中国绝大多数乡村人口心驰神往的地方。城市化、工业化虽然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人口拥挤等系列社会生态问题，但为着相对富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大多数人仍然愿意忍耐。因而与西方社会相比，普罗大众对现代性的二重性的认识并不清晰，对现代性的“恶”虽有抱怨，但并未形成自觉的意识从而诉诸自觉的行动。正因为如此，大多数人对为何要参与乡村旅游并未有清醒的认识，对乡村旅游究竟应当追求什么也是不甚明确。但无论如何，乡村旅游作为旅游业一个新领域正显示出“生命”初期的无限生机。特别是在大中城市，乡村旅游正越来越受到市民的青睞和推崇。

乡村旅游与后现代性：心灵的共振或不谋而合

1、乡村旅游：概念、内容与特征

虽然乡村旅游在西方颇有些历史，目前仍处于快速发展中，但其究竟应当如何界定，却是众说纷纭。不过，学者们基本认可乡村性是吸引旅游者进入乡村旅游的基础，也是乡村旅游整体推销的核心和独特卖点，是界定乡村旅游最重要标志。对于“乡村性”，有学者认为其有如下三个特征：（1）地域辽阔，人口密度小，居民点规模小；（2）土地类型以农业与林业用地等自然用地为主，具乡村型自然景观；（3）具有传统社会文化特征，人与人的关系密切；家庭观念、血缘观念浓厚；社会行为受风俗、习惯及传统道德约束较大；社会变化及生活节奏相对较慢（何景明，李立华，2002）。由此，可将乡村旅游界定为发生在乡村地区，以乡村性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乡村独特的田园风光和人文景观；各种参与性强较的农事活动；乡村特有的民俗与风情。其共性特征是：（1）以农业文化、传统民俗及田园风光（乡村景观）为依托；（2）活动场所限于真正意义上的农（林、牧、渔）业区；（3）农业人口在旅游区占据绝大多数；（4）所有活动均与农（林、牧、渔）业生产密切相关。

“阳朔现象”应当足以说明和佐证乡村旅游的含义与魅力。阳朔风光作为桂林山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蜚声海内外。但很多外国游客的选择却颇有特色：（1）到桂林旅游的外国人如停留时间较长，不少人愿意到阳朔食宿而不会住市内。（2）在阳朔居留的外国人中，流传着他们这些人中的有心人编印的“自助游手册”。这是专门用来指引西方旅客如何在阳朔进行乡村旅游的，据说每一、二年还修订一次。（3）在阳朔旅游的外国人中有的还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感情，每年都会来这里小住。（4）阳朔县城有条古老的“西街”，多年来一直是外国游客集中购物、休闲的地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往来，不少游客与当地入结下了深厚的情意，甚至出现了相互通婚的现象，这条老街因此有了“洋人街”的称号（李肇荣，2002）。“西街现象”所反映的正是这些西方人的“东方乡村情节”。

2、后现代性：文化现象、思想趋向抑或社会状态

就如现代性孕育于前现代性，后现代性孕育于现代性中，发育于成熟或极盛的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后现代性首先表现为一种终结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思想趋向。正如威特姆所言，后现代性是一种历史终结感，是那种包含着进步观念的现代性的历史观的终结（李应民，

2000)。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宏大叙事、或者是解释的最终依据。”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衷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变化的某些方面，这种艺术模糊了‘高雅’和‘大众’文化之间，以及艺术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伊格尔顿，2000）。但伊格尔顿不应当将启蒙主义与现代性相等同，虽然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或原则均可追溯至启蒙运动，但启蒙运动方案中却包含最有价值且与后现代性不谋而合的主要元素，即人类普遍解放的主张（伍德，1998）。这种主张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来源于18世纪法国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既坚决反对封建主义对人性的压制，也没有资本主义那种片面乃至疯狂的理性。

事实上，后现代性源自文艺复兴、中经卢梭及康德的浪漫主义、狂飚运动，直至整个20世纪人本主义思潮长达四、五百年之久的人文主义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后现代性始终以一种建设性的力量蕴涵其中。理性主义仅仅是对于这一传统的一个侧面的诠释，人文主义是其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现代性的终结直接意味着一种人文意义上的后现代性的直接延续（邹诗鹏，1998）。因此，由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不过是理性主义向人文主义的复归。而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后现代性意味着对所有知识学科的人文主义“资格审查”。

那么，后现代性是否是一种社会状态呢？的确有这种主张。在费哲斯通看来，波德里亚和利奥塔就是这种主张的代表。如果说波德里亚主张我们现已处于后现代社会的话，那他也是在批判立场上来说的，而且更多地是从消费社会的角度进行批判的。而吉登斯虽指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现代社会，还没有生活在后现代的社会氛围之中，但是认为我们已经瞥见那不同于现代制度孕育出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的缕缕微光。费哲斯通也坦言，“对于那激发如此巨大的社会和文化理论难题的后现代的出现，我们只能双臂相迎”（费哲斯通，2000）。更有学者从积极和肯定的角度描述了后现代社会的可能状况，“一种可以想象的后现代社会没有阶级划分，没有资源的匮乏，因而可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以及人性化技术高度发展（这种技术不会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更主要的是，在这种后现代社会中，官僚行政管理应被多层次的民主参与所取代”（曹天子，2000）。

简言之，后现代性的几个基本特征是：（1）权威的消解，主体中心地位的丧失与零散化，这可能就是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萨特宣布“作者死了”以及福柯“人死了”等直观宣示的哲学含义；（2）等级的消解与多元价值观的确立。费德勒式的后现代主义口号“越过边界，填平鸿沟”，所呼吁的是要填平精英主义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但后现代性暗含的立场是对等级的彻底消解：哲学不优于其它学科，西方不优于东方，白人不优于黑人，男人不优于女人，工业社会也不优于农业社会等等；（3）深度模式的消失与终极意义的消解。

3、乡村旅游与后现代性的共性或不谋而合

分析表明，作为一种意识、思潮的后现代性与作为一种行动的乡村旅游之间，显示出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密切关系、通达性或不谋而合。

（1）后现代性与乡村旅游透过现代性而相通。二者都在与现代性的对抗中以及对现代性阴暗面的揭发和抵制中成长起来。如果说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自觉意识的话，乡村旅游则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应对策略或对现代性“恶托邦”的本能规避。

（2）对线性进步神话的一致否定。后现代性对现代性中线性进步神话予以否定，并对人类的

终极理性是否可能深表怀疑；乡村旅游则突破现代旅游发展观中的观光—度假—专项旅游这种旅游需求发展层次递进的三阶段论。乡村旅游从动机看包含了：“感知—享受—认知”，从内容上讲则是“观光—休闲—专项”的复合体。它表明了旅游发展的未来方向可以是多元化的，而非简单的层次递进（线性进步）。

(3) 后现代性的感性体验可以在乡村旅游中实现。乡村旅游追求的是心灵的体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感悟，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而非征服与改造自然。后现代性拒绝解释，也反对对深层意义的追求。后现代性向往的感性体验正可以在乡村旅游中得以实现。

(4) 共同主题：怀旧与思古。在后现代学家眼里，现代性的到来使得“一个田园诗般的乐园”和“一个黑暗的中世纪”同时消失，并最终连同精神家园一同丧失（唐文明，2002）。后现代性试图压制不断膨胀的理性主义，力图使社会向人文主义传统回归，回复那种现代性中已难以获得的乡愁情怀。作为乡村旅游的关键性元素的乡村性所具备的纯真自然、传统文化、生活节奏、古朴风情最能让那些具强烈的回归自然、追溯历史的现代城市人寻得心灵上的情感共鸣。

(5) 后现代意识群体应当是乡村旅游的客源主体。在国外，乡村旅游已走向成熟与稳定，乡村旅游市场中最稳定的客源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条件较好的中产阶级人士。正是这些中产阶级人士再也无法长期忍受现代化带来的人与自然的距离，忙中偷闲品味湖光山色，感受树叶飘落的宁静，感悟自然万千变化，以获得心灵的片刻平和；也正是这些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自由人士及文化工作者，对现代性的二重性认识最为深刻，矛盾心态日重，后现代意识或思潮正源自他们或在他们那里获得最大的回响。对现代性的深刻反省或后现代的自觉意识，助产了乡村旅游并使之走向成熟、稳定。中国乡村旅游的相对不发达或不成熟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正在进行中，现代性的弊端还不如西方突出，或者说对基本生存的要求压抑了后现代意识的崛起密切相关。

结论：后现代社会与乡村旅游的命运

吉登斯断言，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时期，而是生活在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在这样一个阶段，现代性的后果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了。因而“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吉登斯，2000）。还有比这更加强烈的要求终止现代性的呼声。盖里菲因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痛心疾首地指出：“不终结现代性的世界，我们的地球和生命将会被毁灭”（李应民，2002）。安德鲁·芬伯格在谈到现代性向第三世界扩张时指出：“各种有效的经济常常被破坏并且没有可行的选择事物的地位。因此现代化对本土居民来说便有了灾难性的后果”（安德鲁·芬伯格，2003）。

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危机意识的结果，后现代性的基本课题是：如何建设性地批评现代性派生的诸多问题，并反思在何种意义上、何种程度上与现代性进行决裂，以及如何提出替代现代性的新方案。人们从不同立场与角度出了各自的替代性方案。伍德认为，取代资本主义或现代性的不是后现代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伍德，1998）。安德鲁·芬伯格极力反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模仿西方现代化模式，对“发展中国家中的一群孤立的技术统治精英只能模仿各种外国模式”深表担忧，希望西方对技术和社会的反思也许能够为中国提供一种更加有选择性和批判性的观念（安德鲁·芬伯格，2003）。吉登斯为我们描绘出了后现代性的轮廓，并认为后现代的秩序是能够实现的。“在一个后现代世界，时间与空间在它的相互关系中再也不听命于历史性了，很难说它是否暗含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宗教复活，但可以想象，将会有一种关于生活的某些方面的稳定性，它

会令人回忆起传统的某些特征”（吉登斯，2000）。因此可以这么认为，后现代社会是可以期待的。这既是一个丰盛的社会，又是一个实现了政治、技术、管理等所有领域民主化的社会，疯狂的理性已被彻底治愈，贪婪的商业主义精神已经消解，人文主义、浪漫主义已全面复归。

日益兴盛的乡村旅游体现了一种不断增强的对现代性偏执性的自觉意识，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同时也表明，现代性的严重后果仍在不断扩张与加深之中，这是一种令人悲哀却又无可奈何的局面。现代性的渗透力如此强大，以至于大众旅游的麦当劳化趋势已扩散到乡村旅游中。虽然专家学者们一再呼吁保护“乡村性”特征，保护乡村旅游的核心价值，但随着旅游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开发的深入，乡村旅游中的“乡村性”特征会受到削弱，“乡村意象”将被不断侵蚀直至丧失。这种趋势在中国等本来“乡村性”特征比较突出的发展中国家更加明显。这里的城乡居民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尚未得到满足，商业主义的逐利性更加直接而迫切；后现代意识也仅仅限于一小撮知识分子，对这种强大的趋势无能为力。因此，乡村旅游的命运注定是悲剧性的。在这场与后现代性的较量中，如果现代性最终取胜，那么疯狂的工具主义理性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将占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社会终将消失，作为对现代性消极反应或逃避的乡村旅游也将失去立足之地。相反，如果后现代性获胜，我们最终进入到后现代社会，那么，整个世界将成为一个比传统乡村社会更加富足的巨大的诗化田园，整个人类的灵魂将得到拯救，心灵不再需要解脱。乡村旅游的历史使命至此宣告终结。

参考文献：

- [1] 李应民：《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现代哲学》，2000年第2期。
- [2] E.M. 伍德：《现代性、后现代性或者资本主义？》，《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 [3] 曹天予：《科学和哲学中的后现代性》，《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
- [4] A.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
- [5] 王宁：《旅游、现代性与“好恶交织”》，《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 [6] 何兰萍：《大众旅游的社会学批判》，《社会》，2002年第10期。
- [7] 何景明、李立华：《关于“乡村旅游”概念的探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9月号。
- [8] 李肇荣：《关于阳朔发展乡村旅游的思考》，《社会科学家》，2002年1月号。
- [9] 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幻想》，华明译，商务印务馆，2000年。
- [10] 邹诗鹏：《理解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2期。
- [11] 费哲斯道：《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
- [12] 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作者简介：左晓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广州 510610

[责任编辑 张应祥]